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長篇書評

俄羅斯的外交政策： 回顧與展望

蘇軍璋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1991 年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政府的對外政策與以往有顯著的不同，隨著不同的執政者的掌權，其對外政策也呈現不同的樣貌。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的變遷繫於領導人個人？如果是這樣，那麼「後普京時代」（之所以將之定位成「後普京時代」，是因為普京卸任總統之後，被任命為總理，普京(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在俄羅斯政壇決策上仍保有其影響力）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會呈現怎樣的樣貌？是不是有一個不同於普京的「梅德韋傑夫道路」，只因為他與普京不同？還是說因為梅德韋傑夫 (Dmitrii Aleksandrovich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 是普京一手栽培，因此「梅德韋傑夫道路」將秉持普京路線？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在去年底（2007 年）普京公佈其矚意的候選人名單之後，一一浮上檯面，今年（2008 年）整個春天，關心俄羅斯問題的論者們無不猜測與討論「梅普組合」對俄羅斯的意義與在政治上的運作，當然也包括在這種組合下俄羅斯政府的對外行為。在蘇聯解體前，蘇聯在整個國際架構底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解體後，雖然俄羅斯做為單一國家的實力與影響力大幅銳減，在經過很漫長的轉型與調適過程後，俄羅斯政府仍在 2003 年被高盛公司列為世界極富潛力的四個國家，「金磚四國」的頭銜吸引大量外資與國際目光，俄羅斯國力顯然迅速上揚，當然國內富含的能源儲量更是不容小覷。做為一個國力蒸蒸日上的大國，其對外行為自然是值得被我們所關注且有意思的議題，再加上這一兩年恰好是俄羅斯國會大選及總統改選的重大



書名：普京安邦之道 - 俄羅斯近鄰外交

著者：顧志紅

出版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地：中國 北京

出版日期：2006

頁數：438 頁

ISBN：7500458975



書名：普京時代 (2000-2008)

著者：鄭羽主編

出版者：經濟管理出版社

出版地：中國 北京

出版日期：2008

頁數：299 頁

ISBN：9787509602362



書名：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外交卷）

著者：學剛 姜毅主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中國 北京

出版日期：2001

頁數：375 頁

ISBN：7010033102

時刻，俄羅斯政府相關決策體系大量換血，這些變遷對整個俄羅斯政府的對外決策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下列這三本書，應該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理解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過去與未來的一些參考，以下分就葉爾欽時代以及普京時代的外交政策做討論，並以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脈絡與未來作結。

一、葉爾欽時代的俄羅斯外交政策

《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外交卷》一書是在葉爾欽（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本文均採台灣熟悉的譯名）卸任後，總結了在葉爾欽時代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如何從親西方的外交取向逐漸往獨立的大國外交轉變的過程。在書中，作者認為甫上任的葉爾欽因為接續了蘇聯大國的許多遺產，包括政治上、經濟上乃至於軍事上的種種，葉爾欽做出了必須向西方一面倒的決策，認為如此一來可以因為盡速融入西方而換取經濟乃至於國際政治上的利益。因此，葉爾欽初掌政權時，便積極推動與歐美各國的友善互動，試圖與西方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且在各種外交活動中均表現出俄羅斯主動退讓的態勢，包括放棄許多軍事設施與強硬主張、從各國撤軍，並且削減與前蘇聯盟國的合作等。但是這樣的讓步並未得到來自歐美國家友善的回應，葉爾欽便展開大幅度的外交政策轉彎，積極推動所謂的「雙頭鷹外交」。

1993 年，俄羅斯政府推出了「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基本原則」，以此作

為此後數年葉爾欽政府對外行為的方針，這份文件除了強調要和歐美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外，也堅決反對美國獨霸的路線，一改前兩年俄羅斯政府一昧屈從的對外政策，而後，在 1996 與 1997 年中，葉爾欽政府陸續推出對俄羅斯外交政策有決定性影響的文件，包括「國家安全咨文」以及「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等，強調「全方位外交」，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並力促俄羅斯成為有影響力的一極的地位，也因此在軍事上俄羅斯政府展現對美國政府較為強硬的態度。

在劍拔弩張的對峙中，俄羅斯仍與北約達成幾項協議，包括 1994 年的「和平夥伴關係框架文件」以及 1997 年的「俄羅斯與北約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等，與北約形成 19+1 的關係，原本看似趨於緩解的緊張關係，卻又因為北約宣布將波蘭、匈牙利與捷克作為首批東擴對象國，並將羅馬尼亞與斯洛維尼亞列為下一次擴張候選國的決議再陷僵局，加上俄美兩國在科索沃問題上的爭議，讓俄羅斯政府徹底了解到光是以軍事實力企圖維護其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絕非易事，同時也使俄美關係嚴重惡化，葉爾欽不但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中止與北約的合作關係，並且召回駐北約代表，而美國準備退出反彈道條約的舉動也使俄羅斯倍感威脅。

另一方面，葉爾欽的「雙頭鷹外交」同時也面向亞太地區，包括日本、朝鮮、印度、越南與他們投入更多心力的中國。葉爾欽政府之所以開始注重發展亞太關係，是因為甫上台時向

西方一面倒的政策成較不彰的結果，轉向強調與亞太國家的經濟、安全乃至於軍事的友善甚至是合作關係。其中，與俄羅斯有領土爭議的日本，在雙方簽署了「東京宣言」、「經濟宣言」等若干文件後，同意擱置領土爭議，並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共同發展經貿關係。在對中政策方面，中俄兩國的關係自 1992 年底葉爾欽訪華後迅速升溫，雖然中間曾因「黃禍論」、邊界與移民等問題出現一些波折，不過都無礙於兩國從「友好關係」提昇到「建設性的夥伴關係」並發展成「戰略協作夥伴」的進程，中俄兩國在葉爾欽時代有著頻繁的政府層級的互動、領導高層互訪以及經貿與安全合作，實現了葉爾欽在 1992 年所說的把發展中俄關係放在俄羅斯對外政策最優先地位的宣示，兩國關係的確緊密而穩定。

我們透過這本書對葉爾欽時代的俄羅斯歷史詳細整理不難發現，在蘇聯解體之初，葉爾欽認為相較於共產世界的封閉，強調與歐美連結會給俄羅斯帶來進步，因而大幅度地向西方靠攏，在此同時，葉爾欽發現他在外交上的大幅度退讓，並未給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甚至是經濟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反倒成為型塑美國獨霸的最佳幫手，甚至損及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因而有所轉變。

葉爾欽的執政離冷戰的兩極體系不遠，多數俄國人民仍然認為俄國足以與美國匹敵，或者說至少不能甘居下風，因此，葉爾欽掌權初期的不顧一切向西方靠攏的政策大受批評，1993 年俄羅斯政府對外政策出現的轉

折多少反映了俄國人民的主流意見。葉爾欽開始在對美政策上展現強硬作風，包括堅持與伊朗軍事合作及積極運用聯合國安理會的功能等，甚至強烈反對北約東擴，並以不惜回到冷戰對峙相迫，這個時候，他們所認知到的國家利益是繫於維護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並希望仰賴軍事實力尤其是核武威嚇，來維護國家利益，雖然，解體後的俄羅斯政府根本很難以軍事實力與美國甚至是歐洲加上美國一決雌雄，然而，這樣的現實仍然無法扭轉葉爾欽時期較為強硬的對外政策。

二、普京時代的對外政策

普京的上台讓這個僵局有了截然不同的轉變，《普京時代（2000 ~ 2008）》就是詳細介紹了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與外交等面向。作者深入探討了普京接掌政權之初的政經與國際情勢，在政治篇裡提到了幾個普京的重要治國理念，諸如倡導「俄羅斯新思想」、「主權民主思想」與「普京計劃」等。普京認為提倡包括市場經濟、言論自由、主張維護人民權利等價值觀應該與俄羅斯傳統強調社會團結的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務實的而且符合俄羅斯國情的新思想，並且將之反映在俄羅斯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戰略構想上，而主權民主則是反映了俄羅斯政府對美國霸權在思想上的抵制，包括反對美國四處干預國際事務以及在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內推動顏色革命等，大聲宣示俄羅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有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所謂的「普京計畫」

則是由普京八年執政時期每年的國情咨文以及三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所構成，在2007年由現今俄羅斯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提出作為未來政府施政重要藍圖，並由普京本人在年底時加以背書，普京指出這份「普京計畫」將是俄羅斯國家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戰略計畫。

普京政府發現整個90年代俄羅斯經濟不斷萎縮，國內生產力持續下滑，這除了意味著俄羅斯人民生活越顯侷促之外，也說明了俄羅斯政府無法再大手筆撥用軍款裝飾大國門面，更代表了俄羅斯在國際地位上的逐步下降根本就是其來有自，僅透過強硬的外交手腕與核武是無法讓俄羅斯重返榮耀的。因此，普京一改葉爾欽時代「震盪療法」的經改政策，轉趨務實路線，以穩定與發展為俄羅斯經濟政策的主軸，為貫徹普京富國強民的思想，普京政府大維強調加強政府職能，並首重能源強國戰略，重新整頓石油、天然氣與電力工業，強化政府對這類能源工業的控管以使其符合國家利益，並且積極與週邊各國合作互動。

在對外政策方面，甫上台的普京面對的是葉爾欽時期所遺留的情勢，科索沃問題、北約東擴、美國醞釀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與歐盟國家關係複雜化等問題，唯一稍微穩定的只有與中國的關係，就像前一本書提到的，在葉爾欽時代中俄兩國就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友善關係，雙方除了展開密切的經貿交流外，在國際事務上甚至並肩採取相同立場，例如反對美國

強行發展導彈系統等。

2000年，普京政府出台了「俄羅斯聯邦安全構想」以及「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等，作為普京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指導方針，這些文件除了表明俄羅斯政府仍然反對單極體系主張多極世界之外，更強調俄羅斯政府的外交政策應該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上，這意味著普京政府的對外政策將比葉爾欽政府保持更多的彈性，並積極投入提升國內經濟的工作，以積累俄羅斯的國家實力，且透過各種外交管道活絡俄羅斯的對外貿易。

當然，普京政府除了周旋在歐美國家之間，同時更積極發展與獨立國協各國的關係，包括與其關係最緊密的白俄羅斯建立聯盟關係、與西方勢力爭奪烏克蘭認同以及與哈薩克及亞美尼亞的關係等。本篇書評要介紹的第三本書，《普京安邦之道－俄羅斯近鄰外交》就對此做了詳細的闡述，作者在本書起始首先就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環境、週邊的政治情勢以及俄羅斯在這樣的情境中如何做出戰略選擇加以論述，並且深入討論俄羅斯與其週邊國家的語言、民族、政府間關係、邊界爭議乃至整體安全等議題，並且進一步將俄羅斯與週邊國家的關係定義為「多層次的近鄰國家關係結構」，包括屬於核心力量的俄白聯盟、很不穩固的俄烏關係、作為戰略夥伴的哈薩克以及建立防禦聯盟的亞美尼亞。

在與白俄羅斯的聯盟關係方面，在葉爾欽時代兩國便展開一體化的相關討論，並簽訂「俄白聯盟條約」，從

1999 年起討論兩國一體化後的許多實質內容，包括憲法、貨幣、國籍、國家機構設置等議題，但也因為過於敏感，而讓兩國一體化的路程出現許多變數，歐美勢力也暗助白俄國內反對勢力試圖掀起另一場顏色革命。烏克蘭就是西方勢力介入下，一場成功的顏色革命，尤申科的當選給烏克蘭帶來了大幅度的去俄羅斯運動，並積極向歐美靠攏，嚴重損及俄羅斯國家根本利益，包括國安、經濟乃至於情感，俄羅斯政府則以嚴厲的喊話以及調整對烏能源與經濟政策作為反制，希望能稍稍減低烏克蘭的去意，但是尤申科政府一系列徹底的去俄羅斯政策，甚至是試圖重振與擴大古阿姆組織的舉措，讓普京政府大為苦惱，也因為烏克蘭的去留問題涉及俄羅斯國家核心利益，普京政府在此議題上態度強硬。哈薩克則因地緣關係，成為俄羅斯非常重要的戰略夥伴，哈俄關係建構在能源與軍事合作以及頻繁的貿易往來的基礎上，雙方關係處於穩固狀態。另外則是與俄羅斯建立起「防禦聯盟」的亞美尼亞，亞美尼亞與俄羅斯的合作對俄羅斯政府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除了因為它位在外高加索的戰略考量以外，更是俄羅斯政府進一步關注喬治亞共和國反俄政策的重要盟友，在國際事務上，亞美尼亞也常站在與俄羅斯同一陣線，俄亞兩國在經濟、軍事、能源等方面也都有相當密切的合作。

三、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整體脈絡與未來

在介紹完這些關於俄羅斯外交政

策的書籍之後，我們可以大致對葉爾欽以及普京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大致的理解，雖然這三本書籍內容偏向歷史性陳述，但其實我們不難從中歸納出一些可以掌握的脈絡。

葉爾欽政府與普京政府一樣強調建構世界多極體系以及與歐美國家維持親善關係（至少他們是這樣宣稱的），但是展現出來卻有極大的差異，原因應在於兩者對國家利益的認知不同，前者將國家利益與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掛勾，而後者則強調經濟發展對國家實力的重要性。因此，雖然前者是希望向西方大步走，但一旦發生衝突則態度強硬，而後者則較強調東西並進，但一旦發生衝突，在考量現實利益之後，態度會趨於和緩甚至是大幅度轉彎。在普京時代，經濟發展顯然排在展現大國風範的強硬外交的前頭，當然，厚植經濟實力的最終目的也在於讓俄羅斯重返榮耀，現階段的和緩，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傾向妥協，應是階段性的作為。況且，俄羅斯在面對北約東擴、科索沃事件、伊朗問題以及美國勢力介入傳統勢力範圍時，均表現出極為強硬的態度，這是因為這些議題已經碰觸到俄羅斯核心利益，妥協或退讓都可能使俄羅斯蒙受戰略及安全上的重大損失，因此，每當遭遇這些問題時，普京政府都不會讓步，並透過各種手段試圖抵制或是延緩不利情勢的進展。

2007 年 12 月，普京從同為第一副總理的伊萬諾夫與梅德韋傑夫中，挑選了背景單純的梅德韋傑夫作為他認可的接班人，有了前任總統普京的加

持，使梅德韋傑夫獲得五千多萬選票，高達七成多的選民支持而當選，並任命普京為俄羅斯政府總理。面對俄羅斯新上任的總統，歐美國家給予較高的期許，認為相較於伊萬諾夫，出身學者的梅德韋傑夫應該會更親近西方，外交政策也可能會較普京更為緩和，至少不會比普京更為激進。但是究竟在未來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是否如外界猜測的，要看未來普京在決策中扮演的角色，還是取決於梅德韋傑夫與普京的關係？

其實可以透過這幾本書籍得出的脈絡發掘一些端倪，那就是不論在葉爾欽時代或是普京時代甚至是現在進行式的梅德韋傑夫時代，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最優先的指導原則，雖然在不同時代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有不同的偏移，但原則始終是不會改變的，而這個指導方針其實也在梅德韋傑夫 2008 年 6 月底的公開發言中得到再一次的證實。況且，梅德韋傑夫曾不只一次表達新政府將延續普京路線的主張，而在外交政策上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也將被擺在指導性的地位，換言之，梅德韋傑夫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否更親近西方的推論，應該注意的不是他與伊萬諾夫的區別，也不是他與普京的關係以及普京扮演的角色，端賴於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是如何被定位。

顯然，所謂的「國家利益」，在葉爾欽初期被定義為向西方路線靠攏以爭取支持，而這樣的外交政策路線，也實際體現在葉爾欽政府所推動的「震盪療法」經濟改革政策上，外交

與經濟政策大步向西方邁進的舉措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在外交層面，原本希冀於向靠攏西方的路線可以為俄國爭取到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落空，導致國內踏伐聲四起，而在經濟上，根據 IMF 資料顯示，葉爾欽上台後，俄國經濟成長率持續呈現負成長，國力疲弱不振，足見「震盪療法」給俄羅斯境內帶來更大更沉重的負擔¹。首先被檢討的是葉爾欽的外交政策，正如本文先前提及的，1993 年葉爾欽政府以「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基本原則」作為新的方針，這是一次重大的調整，這個新的方針實際體現了輿論壓力與領導階層的新共識，俄羅斯政府展開了戮力於透過各種方法，希望回到昔日蘇聯時期國際地位的目標，因此，在許多國際事務中，俄羅斯都積極發聲，將反對歐美獨占鰲頭，並重新回復兩極體系中，蘇聯對世界以及對週邊各國影響力，視為當時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之所在。

但是，疲弱不振的俄羅斯經濟根本無法支撐這種不符合國家實力的外交政策，這也導致了葉爾欽在二度連任之路的重大挫敗，甚至在 1999 年提前下臺，這顯示了葉爾欽執政八年中的俄羅斯政府，不論是早先的向西方

¹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8/01/weodata/weorept.aspx?sy=1992&ey=2008&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922&s=NGDP_RPCH%2CNGDPD%2CNGDPDPC%2CPPPGDP%2CPPPPC%2CPPPSH&grp=0&a=&pr.x=24&pr.y=6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8.7	-12.7	-4.1	-3.6	1.4	-5.3	6.4	1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5.1	4.7	7.3	7.2	6.4	7.4	8.1	6.8

大步走或是後來的理想主義路線，這些外交政策方針，都不是因為按照符合俄羅斯本身的國家實力來制定，錯估了俄羅斯國家利益之所在導致的重大失誤，普京的上台，便扭轉了這種局勢。就像本文先前提到的，普京就任不久，便制定了以務實為取向的外交政策，被稱為「實用主義」路線，換言之，就是制定出以國家實力為依歸、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重點厚植國內實力，對外則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場合選擇對俄羅斯本國最有利益的立場與政策。

總而言之，綜覽了這幾本書後不難發現，在葉爾欽時代，俄羅斯汲汲營營於維持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沒有顧慮到蘇聯解體後政經情勢乃至於軍事實力的轉變，以致於採取過多與其國家實力不相應的強硬政策。普京時代雖然仍以重返大國榮耀為使命，不過卻先以厚植經濟實力與務實外交作為積累國力的階段性任務，但是在面臨有礙於俄羅斯戰略與國家安全的議題上，俄羅斯的態度仍然強硬。梅德韋傑夫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否會出現有別於葉爾欽與普京的舉措？個人認為，除非是在俄羅斯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美國企圖獨佔世界霸權地位，或是在梅德韋傑夫掌權時期俄羅斯國家實力已經迅速攀升到足以與歐美強權爭霸的地步，否則未來的俄羅斯在力圖發展經濟的當口，不會對歐美各國採取過於強硬的政策以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

子安宣邦

國家と祭祀 —國家神道の現在*

周德望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靖國的英靈祭祀，只不過是那些相信日本帝國連續性的政治家或舊軍人們、政治學者或神官們的想法而存在著的。¹

--子安宣邦「誰在祭祀死者？」

冷戰結束之後的亞洲新國際體系中，日本一直扮演著關鍵又爭議的角色。自從八零年代之後，日本社會與政治新保守勢力的新起，包括了天皇、靖國神社、新歷史教科書等等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亞洲各國及日本的國內政治，各項議題的發展，也日漸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這些問題的最主要關鍵，仍在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所帶來的後遺症。日本人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與未來？能否走出二戰的陰影？在所謂「歷史再認識論」的號召下，各種主張重新檢視日本近代化、戰爭史的言論透過政治家、歷史學者、神道學者發聲，逐漸形成重要的社會共識。加上小泉前首相的靖國參拜與其日本主義的強勢作風，更是不斷激化著日本國內及亞洲各國對於軍國主義的恐懼。日本到底應該走向和平國家？還是普通國家？亦或是軍國主義的再興？都與天皇、神道、靖國問題等交錯在一起。

自 2003 年起，先後有三本重要批判右派的著作出版，分別是小森陽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子安宣邦的《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高橋哲哉的《靖國問題》，透過各自的視野對日漸右傾的日本

子安宣邦

國家
と
祭祀

誰が
死者を祀
るのか

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
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新書企劃「一冊でわかる」

書名：國家と祭祀—國家神道の現在
著者：子安宣邦
出版社：青土社
出版地：日本 東京都
出版日期：2004 年 7 月
頁數：221 頁
ISBN：4-7917-6131-6

¹ 子安宣邦，《國家と祭祀-國家神道の現在》(東京都：青土社，2004)，頁 217。

社會提出批判。²子安宣邦為當代日本著名之思想史學者，現為大阪大學名譽教授，一直關注民族國家及文明近代化問題，並以批判丸山真男的近代化思想著名。³子安透過一套「知識考古學」的方法，為其批判理論之基礎，強調「話語」與其背後的文化意涵，論證細密，實不易閱讀。

於《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一書，子安追尋了日本近代化政治神學的發展，並以此批判來回應國家與祭祀之間的關係。在日文版本的封面上，寫了「誰在祭祀死者？」來追溯現在日本國家神道的本質到底為何。該書是以十篇看似各自獨立卻又可串連成整體的文章，加上一篇作者的後記結尾，其寫作方式是透過不斷與神道史研究者對話，來建構這樣的思想批判。

其論述脈絡，前五章先是由日本自身的話語，探討了當代對於「國家神道」的定義。進一步提出不被大家所爭議的「伊勢神宮」參拜才是日本祭祀與政治合一問題的本源；接著延續著日本祭祀的脈絡，討論「靖國神社」所代表的近代化國家意涵，以及這些被國家選擇出來的神社英靈們到底代表了什麼？接著轉向日本的政治思想史，由江戶時代水戶學家的《新

論》一書，從中推論「天祖」的祭祀概念到日本「國體論」的成立。以此為基礎，祭祀國家論吸收了日本國學派的「神道神學」體系，成為日本近代化的政治神學。可以說，子安確認了在日本的政教關係發展中，祭祀一直是肩負著政治與宗教的雙重性，而天皇為主的國家祭祀制度就是日本的真實面貌。

第六章是子安的重要理論核心，尤其最為重視的近代化民族國家概念來解釋日本近代政教關係的發展脈絡。重點在於世俗、國民國家概念與宗教之間的關係。這種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歐洲民族國家，成為了日本近代化所努力想學習的目標。子安用了伊朗與埃及兩個例子，來形容在近代化世俗民族主義的政教分離概念，與傳統的宗教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簡單來說，就是民族國家的建立，來自基督教社會的特殊歷史脈絡，尤其是「政教分離」原則，這讓世俗國家可以將教會等宗教組織納入其中；而傳統宗教的個別、個人化，不過只是要將國家內部的宗教各自獨立、特殊化。因此國家就建立了另一個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國民宗教；在整個近代史的發展中，這樣的民族國家政治神學就靠著這樣的「世俗」與「宗教」之間相互辯證而形成。

子安在第七章之後，將前述這樣普遍性的民族國家建立原則，放在日本的特殊歷史發展來檢視。日本近代史經歷了兩次這樣以「政教分離」原則為號召的世俗主義國家化。先是明治廿二年，確立日本近代化國家建立

² 這幾本書皆有中文譯本，中山政治碩士陳建廷曾發表小森陽一《天皇的玉音放送》書評於政治科學季刊第十期，2006年6月；台大政治碩士葉紜麟曾發表高橋哲哉《靖國問題》書評於政治科學季評第十八期，2008年6月。

³ 子安宣邦的重要著作，包括了《宣長與篤胤的世界》、《鬼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等，約出版了十數本專書。

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其次是昭和廿一年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國憲法公布。

在明治時期的近代國家建立時，日本就已經由「神道的國家」變成「國家的神道」，這個自古的、沒有統一的傳統宗教，被形塑成一種特殊的國民宗教，那就是所謂「國體論」的建立。而戰後的日本國憲法，不過重申了這樣政教分離的立場，也同樣地延續了過去祭政一致的思想。子安認為，既然前後都是主張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日本過去被視為國家神道最主要的爭議點在於「祭祀是否等同宗教」？在天皇制的國民國家化之下，進而導出「祭政一致」卻「政教分離」的結論。如果戰後繼續這樣以天皇制、國民國家為目的的國家祭祀，不就是延續了戰前那個神聖卻又飽受爭議的日本皇國嗎？

最後，子安在靖國問題上，並非具體爭論靖國到底是否違反政教分離？是否真的代表軍國主義？而是透過前述的論述，認為那些神道家主張靖國神社不是宗教、只是國家祭祀，實際上是錯誤且不適當的。理由有二：其一，祭祀在日本的文化脈絡中，本來就是宗教的；其二，國家祭祀這個概念其實對象是國家，不是那些戰死的人。子安認為真正要祭祀死者、信仰和平就應該紀念所有因戰爭而死的人，如沖繩的和平紀念碑，包括了敵我雙方的軍人與平民；而不是如靖國神社那樣，由國家選擇祭祀對象，紀念為國家犧牲的死者，那目的只是民族國家自身，這對反省戰爭、和平

是沒有幫助的。

在面對右派組織不斷指出靖國神社只是如同其他各國本皆有之的國家祭祀犧牲者的行為，就如同美國阿靈頓公墓或是我國忠烈祠一般；如此相當正當性的說法卻被子安透過重新檢視近代化的政教關係，指出那是不可行的。在後記「誰在祭祀死者」文中，進一步指出歐洲各國對於死者的祭祀活動也一直日漸沒落，因為大家都會實際理解到戰爭本質性的問題，那就是不管多麼正當，都會製造大量的死者。

綜觀全書子安是以批判普遍的近代化國民國家宗教的建立，與日本自有祭祀宗教行為的特殊性的相互辯證關係來論述。子安認為不管人們如何辯解，由宗教的定義來看，祭祀是無法與宗教分離的；由近代國民國家形成來看，所謂「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化，不過是國家為了建立其自我的政治神學時，為了獨佔國民信仰的策略。身為非歐洲國家的日本，更是具體實踐了這樣國民國家化的發展路線。因此，國家神道在表面上超越了宗教、以祭祀的方式重現了歐洲政教發展經驗下，國民國家的「主權」概念。為國家犧牲的人可以被祭祀，代表了國家具有神聖性；既然國家至上，那不就代表了為了國家生存發展的戰爭是可行的？在此思想下，才有日本右派那種「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出現。因此，國家不應該祭祀，也不應該發動戰爭就是子安宣邦對於當代日本政治最大的控訴。

子安如此深刻的批判，正反映了其身為日本激進的左派思想，但對於「傳統的日本」應該為何？「近代化的日本」應該為何？這些問題子安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見解。而是以「批判」為方法，以歐洲歷史發展經驗對亞洲所帶來的近代化問題，來促使人們反思眼前事物在話語、表現之中所反映出來的「本質」。

子安的論述中有兩點值得提出來批判討論的：首先，是所謂政教分離原則，子安雖然口口聲聲說這是歐洲基督教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政教關係，並成為世俗國家的「樣本」被日本所遵循，且因此發生如軍國主義般格格不入的現象。但是我們仔細推敲，子安不斷提出在日本祭祀等於宗教，而歐洲經驗的國民宗教也是宗教等等概念，不就是主張一種「更為激進」的「政教分離」嗎？以此標準，他所謂本來那種前現代的、和平的、自然發展的神社神道是「純宗教」根本就無法有公共性存在，一切都是地區或個人的。反過來思考，子安認為，已完成近代化的現在，必須嚴格把宗教排除在公共性之外的原因，不就是由於宗教公共性都是「純政治」的存在，因而都是國民國家的陰謀？這樣一來，子安的論述不就陷入自由主義政教分離原則被批判的困境？⁴

其次，子安雖然不斷批評日本在明治時期學習歐美帶來的近代化經驗，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其所要捍衛

的正是戰後被美國指導近代化下的「和平憲法」；尤其是「政教分離」以及「放棄戰爭」條款。如果以世界普遍性與日本獨特性這兩方向來看，很明顯的，雖然子安在論證時使這兩者相互辯證，但卻在結論指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價值判斷，並以此來期待日本的未來。固然子安的目的在於反思當代國家的政治神學，以邁向和平，但在其不斷批判民族國家近代化的普遍主義之後，那麼屬於日本自我的特殊主義還剩下什麼？

國家與祭祀的關係，在日本一直是個重要卻又解不開的謎，但卻是當代日本政治與亞洲國際關係的重要根源之一。子安宣邦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深入探討了這樣發展的思想演變，其所對話、分析的資料多為「歷史」、「宗教」、「神道」等細節，並重視其論述邏輯、目的與時代意義，這樣廣範圍的材料使用以及深入的邏輯思辯，並以此回應當代的社會重要政治議題，實提供吾輩政治學者一個反思何謂政治研究的契機。

⁴ 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於宗教等整全性學說的排除，也因此深受保守主義、社群主義者對於「國家價值中立」的一系列批評。

王向遠

「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
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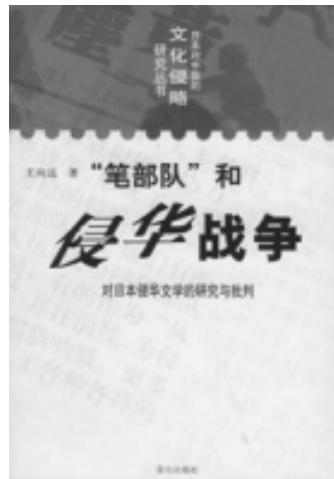
童華仁 /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所碩士

自一九七零年代中共與日本建交後，中國與日本之關係處於時好時壞的局面。在經濟層面，雙方相互合作；但在歷史政治層面，雙方卻存有難以溝通的隔閡，而這樣的隔閡，使得雙方之交流過於表面。其實並非彼此不瞭解雙方各自之歷史發展，而是由於雙方皆欲求保留自我之主體性而拒絕彼此更深一層的體會。

本書《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即是在此一立場下，描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前，其與中國有關的文學創作。在八年抗戰時，日本曾派遣「筆部隊」到中國進行觀察，「筆部隊」，又稱「筆桿部隊」，是在日本軍閥主導之下，日本政府徵招文學作家所組成的從軍作家部隊，其目的主要是歌頌皇軍英勇作戰而創作文學，向日本國內民眾進行宣傳，讓民眾瞭解這場戰爭的戰況，型塑日本民眾對當時中國形象。另方面的目的則是派往日軍佔領地區或戰地，配合日軍的佔領政策從事文宣工作，或寫作戰地背景的寫實作品。

本書作者王向遠透過對「筆部隊」以及相關的文學創作進行揭露與批判，希冀從日本人的意識深處追究殖民侵略中國大陸的深層根源，讓中國的讀者能對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歷史有更為全面的理解，同時作者認為這部分的研究，也是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近代日本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作者在前言時定義的「筆部隊」，認為凡是以文筆的方式、以文學活動的方式參與、協助日本殖民



書名：「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

著者：王向遠

出版者：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1999年7月

頁數：324 頁

ISBN：7-303-05119-8

侵略中國大陸的作家，都可以歸為「筆部隊」。並且定義「侵華文學」就是貶低或曲解中國大陸的題材，為殖民與戰爭服務的日本文學。「筆部隊」及日本侵華文學，是所謂「思想戰」、「思想宣傳」的主體，為日本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和滲透的主力，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重要載體。對於作者的定義，筆者認為過於廣泛。因「筆部隊」除對佔領地的「宣撫文學」外，主要的讀者為日本民眾，而非是中國民眾。作者主要是以中國之立場為出發點，對日本進行控訴，但是如果以日本的立場為出發點時，是否這類的文學能被歸為侵略文學呢？這部分實則有待商議。

作者在前四章，主要是介紹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侵華文學的思想淵源、發展和題材。將當時的某些著名思想家，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岡倉天心等人視為軍國主義的濫觴。但是綜觀這些思想家，當時所面臨的時代背景來看，與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面對國家傾覆之際，目的都是富國強兵。以日本在當時的處境來看，為證明自身能與西方平等相處，學習西歐諸國的殖民行為。這樣的手段在當時的環境背景而言，有其特殊性氛圍帶來的意義存在。此時的文學創作陸續出現一些以中國為背景的作品，並且或多或少都帶貶低中國之色彩，也是在那種時代特殊性的情形下產生。在這段期間有所謂的「大陸開拓文學」與「滿州文學」，主要是日本作家對中國的情懷，並對日本民眾推銷中國，反映當時的日本對於中國既帶有貶意，卻又充滿幻想與夢想。只是在作

者的眼中，這些作品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物，內容充滿著偏見。

作者在第五章與第六章將「筆部隊」進行區分，分為以作家為本業的軍人和以軍人為本業的作家。前者為一般所謂的「筆部隊」，後者則是屬於正規作戰部隊。但兩者的主要目的都是將戰場的情節，書寫成文，讓在日本內地的民眾瞭解戰場上的情況，將日軍的行徑加以美化，杜撰日軍和中國老百姓彼此「親善」的互動，炫耀日本軍人如何出生入死，誇耀戰爭體驗。同時在第七章說明日本國內的民眾是如何表達他們對於戰爭的觀感。主要是透過詩歌創作，也就是所謂的「和歌」與「俳句」，反應日本民眾在與中國戰爭的這段期間，他們的觀感為何。大部分似乎都站在支持戰爭的立場。作者認為除戰爭之因外，詩歌創作之所以會如此氾濫，主要是因為和歌與俳句創作形式簡單、自由，並且庶民化，只要有些文化修養，都可吟詠寫作，形成全民皆詩人的局面。但當時日本政府採取輿論控制，如果不考量此點，單就報章雜誌上的詩歌，就認為日本整體陷入戰爭迷思，似乎過於武斷。

第八章則是描述日軍為鞏固在中國淪陷區的統治，使淪陷區成為他們的後方基地，組織「宣撫班」，對淪陷區實行懷柔政策，企圖用恩惠拉攏、中國人民，對淪陷區老百姓進行宣傳和教育，扶持親日組織，破壞抗日活動。而這些宣揚日軍的文學被稱為「宣撫文學」，作者認為這反映日軍的「宣撫」活動，在「侵華文學」中佔有特

殊位置，或許是因為這一類的文學是以中國民眾為對象的創作，而非如同其他作品。

第九章與第十章則是作者分析與批判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兩部反映時代的作品。兩人各為第五章與第六章的代表性人物。石川達三的《活著的士兵》為「筆部隊」的代表作品，算是日本文學中僅有的真實描寫日軍在中國令人髮指之作品。但石川卻因此作被判徒刑，此後奉命「戴罪立功」，再到大陸戰場觀摩，寫作為戰爭歌功頌德的《武漢作戰》等小說。作者在此指出石川對於這場戰爭從沒有正確認識，只是從自然主義之角度下描寫戰爭，其主觀出發點決不是「反戰」。作者接著從情理而論，認為石川作為自願到中國戰場從軍的作家並且身為「軍屬」（其兄是職業軍人），卻要作個「反戰」作家，是不合邏輯的。且在整個戰爭中，石川是非常活躍地支持戰爭。他在戰後曾說：「戰爭是兩國幹出來的，不應該說壞事只是一國幹的。」、「我沒有看到屠殺事件，連痕跡也沒有看到」、「生在那個時代，我只有描寫戰爭。所謂『聖戰』我不相信，所謂『侵略戰爭』我也懷疑……我只是描寫戰場上的戰爭。」作者認為只是顯示出石川對於戰爭並無清楚的認識。但筆者認為石川畢竟體驗過實際戰場，對於戰爭的觀感，並非是無體驗者所能理解。作者的批評似乎過於主觀。

接著分析代表「軍隊作家」的火野葦平《士兵三部曲》（含《麥與士兵》

《土與士兵》《花與士兵》）。作者認為這是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歌頌日軍，侮蔑醜化中國軍民，向國內的日本讀者傳達戰場上的片面、乃至錯誤的信息，煽動日本國民對戰爭狂熱，沒有充分反映日本在中國的真實情況。雖此，但卻足以讓後人明瞭，站在日本的角度，是如何思考對於中國戰爭的觀感，有其一定的重要性存在。

第十一章與第十二章主要則是論述日本在戰爭後期，日本文壇配合日本軍部的發展，主要目的是宣傳所謂的「亞細亞主義」、「大東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之類的思想，並將這些思想等同於「日本主義」。沒有考量這些思想背後的複雜脈絡，就單一立場論述，這樣只會造成誤解加深，無法真正理解日本。雖然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連續三年策劃招開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主要目的是為對中國淪陷區的文學實施干預和滲透、企圖把將中國文學捲入「大東亞戰爭」。反而顯示日本在某種層次方面，不認為中國為這場戰爭的主要敵人。

最後兩章作者針對日本文學在這段戰爭期間的責任追究。首先作者對於日本是否有「反戰文學」進行分析，認為從全面發動戰爭前夕一直到戰敗為止的十來年間，整個日本文壇全面軍國主義化，二十世紀初期的反戰「無產階級作家」也大都「轉向」支持戰爭。反戰文學、抵抗文學幾乎絕跡，連被中國學者視為「反戰」、「抵抗」

的幾個日本作家，實際上也沒有「反戰」。作者覺得對於侵略國而言，真正的「反戰文學」，應該是戰爭中的反戰文學。不能以戰前或戰後發表的某些作品為據，因此斷定日本有反戰文學並予以過高評估。卻同時也描述日本本身對於是否有抵抗文學的問題，在日本有其特殊含意，日本人認為「文學的抵抗」並不等於「作家的抵抗」。抵抗文學並不是使用某種藝術形式或藝術手段去抵抗，寫作時不涉及時事政治、戰爭的純文藝作品，就算是抵抗。

作者雖在此提到為何日共和左翼作家會轉向的原因，但判斷標準過於表面，認為主要在政府的迫害外，則與日本民族性有關。認為是日本民族歷來並不固守先驗抽象的絕對觀念，並且思想信仰淺薄，常常根據現實需要加以變通和調和，擁護缺乏廣視野的狹隘封閉的島國民意識，這些都造成「皇國」觀念的廣泛宣傳和深刻滲透。這邊間接反映作者在本書對於日本，是採取一種高姿態的立場，而非以平等之立場進行分析。

最後作者對於日本戰爭期間的文學作嚴厲的批判，認為日本絕大多數文學家都是「戰爭協力者」，對戰後關於戰爭責任問題的聲討和追究卻虎頭蛇尾，半途而廢。認為日本戰後文學的總體傾向，實質上不是反對侵略戰爭，而是反對「戰敗」；不是反省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現日本人本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反對戰後的和平秩序，發洩對戰敗投降的不滿和悲哀，甚至公開為侵略戰爭辯

解。這或許也是現代日本與中國，甚至是東亞地區國家無法真正互相往來的原因之一吧。

筆者認為本書整體上雖然評論有些部分可能過於主觀，全然站在當今的中國立場去思考論述當時的日本文學。這是否代表如果要評論當時的日本，必先帶有預設立場呢？不過對於不瞭解日文的讀者，卻又想明白日本文學在當時是如何對於中國的闡述，本書是有其參考價值。但如果想要更為全面性與整體性的瞭解日本如何透過文學建構中國形象，本書作者在2007年時出版的《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會比本書更具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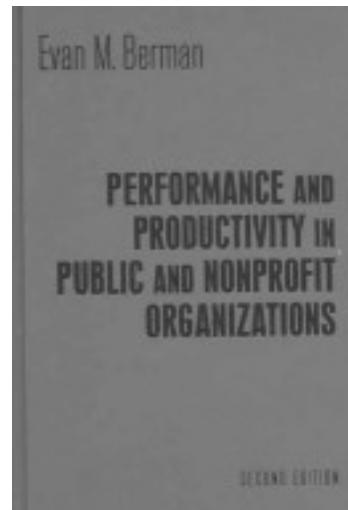
Evan M.
Berman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鄭敏惠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博士生

隨著 1990 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英國、美國、加拿大、紐西蘭以及澳洲等國家相繼推行各項政府改革，多以績效導向為各國政府從事改造的目標，藉由目標與效能的建構，改善服務內容與品質，並強調重視個人與機關課責的政府施政績效，本書以重視績效導向之時空環境系絡為縱深，闡述績效如何成為公共與非營利組織保持創新、活力與社會關聯性之關鍵，提出六項績效與生產力提升之策略工具組合，並融入新公共服務之公平正義與參與式民主，建構績效型政府治理，以回應民眾需求並落實行政課責。

近年來「績效」雖廣為組織所應用，E. Berman 則指其概念常被視為效率與高生產水準，而忽略公共服務的公平正義本質，作者認為績效係資源有效能與效率的應用以達成目標，強調產出(outputs)與成果(outcomes)效能，以結果與任務為導向，而非以投入或過程為導向，¹並以效率、效能以及公平正義之 3E 概念，區分與詮釋公共、營利及非營利組織之績效價值，²公共組織之績效應強調效能與公平正義，



書名：*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著者：Evan M. Berman

出版者：ME Sharpe, Inc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6

頁數：226 pages

ISBN：0765616076

¹ Berman(2006)之「績效」係指有效能與效率的資源應用來達成結果(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to achieve results)，「效能」(effectiveness)則重視產出(outputs)與成果(outcomes)之測量，屬於結果層面(as the level of results)的測量，「產出」界定為機構業務之立即性結果(immediate results)，「成果」則為測量目標達成度；「效率」(efficiency)係指生產財貨與服務的單位成本，為成果(包含產出)與投入之比值(outcome/input)，屬於業務達成之成本；「生產力」概念不僅為效率的測量，亦包含產出與成果。

²彭文賢(2008)對於績效與生產力之應用，認為生產力(productivity)概念可視同績效，多為企業營利組織所應用，公共與非營利組織於新公共管理改革興起後則多應用績效概念。

營利組織則強調效率，非營利組織則需效能及效率兼具；公共與非營利組織績效之效能層面，其政策計畫係以顧客為導向，具有公平滿足不同團體或個人需求之組織成果效能，於效率層面則為應用管理以降低計畫成本；此外，透過公共參與廣徵民意以增加民眾公共信任，亦為重要之績效提升觀點，績效提升過程則包含組織診斷、方案策略、執行力與成果評估。

公共與非營利組織活化與績效提升，端視組織能否善用組織成員與資源，並針對組織本質與業務活動選擇績效策略與途徑，本書提出六項提升組織績效之策略工具：

1. 社群本位之策略規劃：

策略規劃包含事先規劃、研究、設計與執行四個有助於組織建立共識以邁向改革之階段，社群本位(community-based)增加策略規劃由下而上之過程，整合較多決策者與行動者的參與及共識，有助於因應處理日益複雜之社群現實問題，例如：地方經濟發展、社區公共安全、環境保護與教育等，更需善用地方組織網絡擬定合作策略；此由下而上途徑策略亦可應用於中央與地方機關分權、地方利益資源為主之聯邦計畫，以及協助國與國之經濟發展。

2. 顧客導向的品質典範：

組織重視績效提升係源自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之品質典範³的出現，包含改善組

織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之顧客導向(customer orientation)、改善無效率服務流程之流程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賦權成員並課責成果以使組織具回應性之賦權授能(empowerment)，以及績效測量等策略；Berman 認為重視組織內外部成員與系統為應用品質典範之核心價值，全面品質管理邏輯有助提升品質與生產力，而傳統管理則提升了生產力卻造成品質降低。

3. 資訊科技之應用議題：

資訊科技廣泛應用於組織績效管理，透過電子互動改善資訊取得與提升顧客雙向溝通，既滿足公眾需求亦降低組織成本；透過網路協定之電子化政府應用形式有四，一為政府對公民(government-to-citizen, G2C)增加線上資訊，便利公民資料取用與申請；二為政府對企業(government-to-business, G2B)以簡化企業申辦流程；三為政府對政府(government-to-government, G2G)事務處理，減少轄區爭議與善用補助款計畫；四為提升內部效率與效能(internal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EE)；然而，資訊科技安全性與電子化民主治理爭議，則為公共組織資訊應用需考量之議題。

4. 善用成員生產力提升策略：

組織成員為績效之關鍵，組織生產力問題部分係源自組織規則、管制或過時的流程所致，因此，Berman 提出激勵與賦權授能策略，以增進成員溝通、預防組織問題產生，從而提升

³ Berman(2006)指出品質典範(quality paradigm)為管理者廣泛思考顧客服務與需求，發展創新途徑以改善服務的提供，強調顧

客導向與改善服務品質，以提供更快、更好及低服務成本之原則。

組織生產力與績效，除了實質激勵誘因方案外，亦包含營造成員歸屬與認同感，另外建立負面限制亦為必要；賦權授能為適度賦予成員決策與課責權限，以使組織更彈性快速地回應顧客需求，涉及法令議題則不宜賦予，再者，賦權授能並非快速獲得成果或效益方式，實為一錯誤嘗試之過程，組織需耐心以待並予以鼓勵，而非批評與枝微末節式管理。

5. 新公共組織形式：

公共組織因應社會環境變遷進行創新改革，須考量顧客需求以及成本效益，本書提出四種組織形式策略以提升績效，一為民營化(privatization)，透過私部門執行公共服務，但易形成責任規避與降低服務競爭性；二為結合組織網絡之合作協力夥伴關係(partnership)，其網絡管理至為重要；三為透過汰換更新組織功能與層級，以降低成本提高組織效率之組織重整(realignment)；四為針對單一組織或轄區無法處理之業務而設置之特區與管理局(special district and authority)。新公共組織形式涉及課責與時間性，因此，選擇組織形式時須考量二條件，一為任務責任歸屬，二為暫時或永續的業務結構本質。

6.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分為專案界定、專案規劃、專案執行與專案完成階段；在明確理解顧客或組織需求後，進而詳訂目標、規格、成本、資源與時間為專案界定階段；專案規劃階段為資源與計畫達成之控管，以及了解顧客參與後之改革需求；專案執行階段最為組織所重視，強調績效控制以及衝突協

調技能；最後則為檢驗成果之專案完成階段，完整呈現顧客意見與實質成果，並包含執行效益與待改進之處。

本書提出一套協助提升績效生產力之策略與工具，從中可歸納出三個核心意涵，一為以廣博的策略計劃為基礎，不同於傳統策略計劃模式僅限組織成員，而係涵蓋廣泛內、外部社群本位的策略思考，雖此策略之任務較為繁複，但對公共與非營利組織而言，貼近現實需求與意見方可使政策成果具整體社群綜效。第二為因應環境係絡發展，提出夥伴關係、民營化、組織重整以及特區與管理局之意見，雖非創新之想法，然作者提出如何善加應用以及落實課責之觀點。第三個提升績效與生產力意見為品質典範，此意見包含全面品質管理以及 Osborne 與 Gaebler(1992)所提的顧客導向等，除了闡述品質典範外，作者則提出各種效率分析與資訊科技系統的量化意見，對於公共與非營利組織成員之激勵，則特別強調賦權授能與團隊合作。

面對社會變遷、公共行政典範的轉移，到公私組織界線模糊的網絡式組織，本書透過績效與生產力提升為主軸，論述應用各類策略工具的核心價值，整合各學門學術知識概念，輔以可操作化的流程與步驟，提供組織明確與實用的指導方針。當組織朝向透過公開透明化的績效報告展現績效效能，使政府機制更具課責時，其績效成果是否體現組織使命與精神？公共組織並非營利組織，其所追求之目標不只是效率、效能，更要實現公平正義的憲政價值，過於重視結果與績

效亦可能導致過程的草率與不民主，
公共與非營利組織績效意涵甚廣，不能僅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績效提升，亦須回應組織使命之公平正義，以實踐符合公共利益之組織目標與價值，建立實質績效提升之政府治理。

參考資料：

1. Berman, Evan M. 2006.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nd , London: ME Sharpe.
2. Osborne, David, & Ted Gaebler. 1992.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3. 彭文賢(2008)，世新大學「公共管理理論發展」課程筆記。

Hannah Arendt
蔡佩君 譯

責任與判斷

蘇翊豪 /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生

一、前言：

「責任與判斷」是鄂蘭的學生柯恩編纂而成的論文集，鄂蘭的這些文章除了「小岩城事件的反思」外，大抵完成於 1964 年至 1975 年間。鄂蘭在這期間構思其判斷理論，而促使其發展判斷理論的關鍵事件是，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接受的審判，事隔兩年後鄂蘭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提出「罪惡的平庸性」解釋其罪行。¹(蔡英文，2008)

評論本書的首因在於台灣近年有關「轉型正義」研究的熱潮，對那些在白色恐怖時期犯下罪行的人，應該要擔負什麼責任？導致他們判斷力消失的因素是什麼？而對於未曾度過那段歲月、未曾身歷其境的人而言，我們能否有立場指責評判他們的作為？上述種種議題可從本書中獲得更深層的思考與啟發。

二、責任：

第一部「責任」收錄四篇文章，分別是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集體責任、思考與道德思量。其中第一與第三章提到，在納粹統治期間犯下罪行的人，最常引用為脫罪的辯解可整理成以下四類：集體責任、齒輪理論、較小之惡、上級命令與國家行為。鄂蘭對上述辯解一一加以反駁：

集體責任：集體責任意味著我身為一個團體的成



書名：責任與判斷
著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譯者：蔡佩君
出版者：左岸文化
出版地：台灣 台北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頁數：358頁
ISBN：978-986-6723-06-3

¹〈《責任與判斷》導讀〉，第 7 頁，收於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責任與判斷》，台北縣，左岸文化

員，無法隨自己的意願而解除此身分，我必須為我沒做過的事承擔責任。但是有責跟有罪是兩回事，後者是可歸咎的個人性具體作為，納粹德國的案例即屬罪惡；然而，自動自發承認集體罪惡的結果，就是在幫那些實際上做了壞事的人漂白，因為當所有人都有罪時等於所有人都沒罪。

齒輪理論：獨裁統治的決策者縮減到一人，只有他要負擔政治上完全的責任。但其他從上到下的人都是齒輪，不就代表著沒辦法歸咎任何人？事實上受審的不是制度、歷史，而是一個人！他是作為公務員的身分而受審的。

較小之惡：那些選擇較小之惡的人通常很容易就忘記他們曾經選了惡，這種說法是極權政府有意識的制約官員與公眾，散佈拒絕合作會更糟的言論，使他們接受邪惡本身。

上級命令與國家行為：兩者乃不一樣的概念，前者仍在司法管轄權內，收到命令的人應該能辨識其犯罪本質；國家行為屬主權行為不受法律管轄，經常為了自衛而犯下罪行²。儘管每個組織都要求服從，但「服從」命令並不等同於「同意」其統治，所以事實上他是「支持」那個要求服從的權威！

「若干道德哲學問題」是鄂蘭在紐約新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的授課講稿，這章進行一系列的道德哲學問題思考，這些問題包括道德崩潰成為容

² 即國家理性之運用，該犯罪行為有助於維持合法性及國家的存在。

許任意更改的風俗、「誘惑」「努力」與為善為惡之間的關係、「思考」的內涵、惡之本質、意志的作用與意志的自由等。

上述議題很長時間被擱置著，直到戰後審判戰犯時才搬上檯面，而鄂蘭一面引介蘇格拉底等哲學家的思想，一面鋪陳她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思考與道德思量」則探究「思考能力之欠缺」與「惡之問題」的內在關聯，內容大致承襲第二章的各項議題。

三、判斷：

「判斷」由四篇文章組成，鄂蘭對於小岩城事件的評論主要基於政治與社會的差異，前者的核心是平等而後者則是區隔，重點在於避免將區隔的作法踰越至政治及私人領域，所以政府立法廢除黑白學校的隔離乃是侵犯社會自由。

「『代理人』沉默之罪」評判梵蒂岡天主教會對納粹帝國惡行的沉默，使得受害教徒不僅「被所有人拋棄了，甚至被基督的代理人所拋棄」³。「自食惡果」批評美國政府一再避免承認外交及內政的失敗，甚至想以遺忘的方式治癒所有傷口，為了形象而說謊其實和由被意識形態所導引而說謊的極權國家相去不遠。

「審判奧許維茲」主要針對集中營裡的長官、迫害者，鄂蘭認同維也納律師杜爾麥爾的觀點，應當翻轉無

³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64, <《代理人》：沉默之罪？>, 傑諾米柯恩 (Jerome Kohn) (編)、蔡佩君(譯)，收於《責任與判斷》，台北縣，左岸文化，第 287 頁。

罪推定原則成：他們應該都被視為有罪，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無罪。而最有力的論據之一就是「獵兔」「柏格擺」這類虐待方式，無一涵蓋在上級命令中，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發明的裝置。

的主因。

四、評論：

鄂蘭對於納粹戰犯的譴責主要基於個人主義的角度，認為他們訴諸集體責任等結構因素，其實只是要開脫個人的罪責。筆者認同罪責的承擔者是個人的觀點，背景結構最多只能當作減輕罪責的考慮，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鄂蘭的「判斷理論」對於一般人而言是否過於嚴苛？

針對那些自願參與或者未加思索即參與納粹暴行的官員，確實該承受這樣的責難，但被生計、威脅所迫的人既無法勇於選擇逃離或死亡，更無法積極導正政府作為，留下來成為他們唯一的生路。換句話說，難道他們不也是「國家理性」的受害者嗎？所有作惡的人被「一視同仁」地當作道德譴責的對象，然而法律懲罰的標準似乎難以也不應將所有人都等同視之。

以此標準省思前言所提及的轉型正義議題，筆者認為旁觀者與作惡者同樣身為國家的一員，同樣背負著父輩的罪惡與受祐於祖先的功德，絕對有資格對他們進行道德評判。而那些所有曾經參與作惡的人，都應接受他人與自己良心的譴責，然而法律的懲制則視作惡者的位階為準，最嚴厲的處置當加諸於決策者之上，因為他們的權力乃是迫使下位者陷入判斷困境

謝淑麗
(Susan L. Shirk)

脆弱的強權： 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左宜恩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隨著奧運的開幕以及即將於2010年於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中國似乎已然向世界證明：過去的「東亞病夫」已非吳下阿蒙。然而中國於近幾年來的快速崛起，其背後所隱含的若干不穩定因素，卻使得這個新強權似乎始終無法站穩腳步，稍有不慎便會跌個鼻青臉腫。謝淑麗(Susan Shirk)以她對中國敏銳的觀察，以及透澈的分析試圖找尋出中國不安的因素，讓世人得以瞭解此一強國的脆弱面，在增進認識之餘，進而得知如何與此「脆弱的強權」打交道，方可避免因誤判形勢而引爆此一國際政治舞台上，最具威力的未爆彈。

如同書名所言，中國現今處在一個矛盾而弔詭的境界，一方面國力突飛猛進使其有成為全球霸主之氣勢，但另一方面卻隱含諸多不安因素阻礙其邁向大國之路。謝淑麗認為，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與成就，由於內部政治改革無法跟上發展的腳步，而埋下政權不穩定的種子。有別於台灣學界慣常以「派系鬥爭」作為分析中共領導權力分配的主要途徑，作者於本書中乃從結構組織層面切入，探討中共領導人如何妥協於國家及黨組織利益，並因此影響其內政、外交決策之作成。

作者指出，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由於缺乏過去毛澤東、鄧小平所具有強大個人魅力及黨內控制力，更缺乏軍事背景之奧援，因此在推行經濟改革時，面對黨內軍方、宣傳部門等強大保守力量時，難免會有左支右絀之感，不得不與之妥協，以求順利推行各項政務。黨內保守勢力因而取得一定程度



書名：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著者：謝淑麗 (Susan L. Shirk)
出版者：遠流出版
出版地：台灣 台北
出版日期：2008年5月
頁數：329 頁
ISBN：978-957-32-6306-7

之政策影響力，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與發言權，也逼迫領導人採取較為強硬之對外政策。

從意識型態角度而言，在推行改革開放後，原先奉為圭臬的馬克斯主義遭到嚴重挑戰，中國政府為維持政權之鞏固，因而透過強化民族主義教育以爭取人民向心力，成為發動群眾、動員民力以完成各項政策目標之利器。

當前引起中國內部不安的三大問題，依作者之見包括台灣、日本以及美國三者。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對美日兩國採取較為友好及理性之政策，使兩國關係能保持穩定。但江澤民則為了鞏固權力基礎，大力鼓吹民族意識的結果，造成反噬作用，在日本戰爭責任、美國軍事威脅以及台灣問題中，逼迫政府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以滿足其民族情感。政府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民憤而垮台，成為中國內部重大的危機。

除了民族主義作祟外，領導人本身也成為處理上述問題之關鍵。作者認為，江澤民受到成長背景（為中日戰爭下的孤兒）影響，使其處理對日、美、台問題時，傾向於採取強硬立場而缺乏過去毛、鄧時期的彈性與務實。另一方面，陳水扁所採取的對抗政策，也一再挑動中國人民敏感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政府不願失去台灣而引發人民不滿，引起政治動盪的壓力下，使得兩岸關係成為影響中、美、日關係之重要變數。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也強化了中國人民對美國霸

權威脅的不安，認為美國終將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阻礙（另一則為日本）。

最後作者總結認為中國最大的不安因素在於內政，中國的外交政策往往為內政的延伸。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美中兩國依賴日深，一旦中國出現任何危機，美國終將深受重創。作者呼籲美國政府若能做到彼此尊重、分享權力、共同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台海兩岸展開和平對話、抑制日本軍事發展等具體作為，將可降低中國內部不安，促使領導人採取更為開明、具包容性之外交政策，使美中兩國最終將成為全球領導之伙伴，達成區域及世界和平。

作者為美國最早獲准前往中國訪問與研究的學者之一，更曾任掌管中國事務之助理副國務卿，對中國內政與外交政策具有深刻之認識。本書相較於其他有關中國發展危機之論述而言，具有以下特點：首先，有別於盛行一時的「和平演變論」，作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使得國內社會因發展不均而產生「外強中乾」的危機，與西方各國日漸強化的經濟互賴，也使得一旦中國因內部危機而瀕臨崩潰，所造成的衝擊將廣及美、日等強國，產生世界性的連鎖效應。

第二，不同於「中國即將崩潰」等書以官僚腐敗、少數民族爭取獨立而產生動亂之論點，謝淑麗則以中共政權的「萬靈丹」：意識型態，作為分析之核心，以不同的視野觀察中國崛起的背後所隱含之危機。

最後，根據作者觀察，中國內政與外交政策往往為內部保守與改革兩大勢力角力下之產物。由軍方以及宣傳部門所代表的保守勢力，與領導人及新進官僚所代表的改革派在外交政策上往往採取對立態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交部近年來逐漸掌權的新進官僚（例如書中提及之前外交部副部長，現今國台辦主任王毅）在制訂外交決策時，已逐漸擺脫過去意識型態教條主義之陰影，改以較為彈性、穩健之策略，靈活地與美日等國建立友好關係。

謝淑麗長久以來對中國官場之觀察，以及任職政府期間與官方人士之交手，不但提供許多寶貴之第一手資訊，而其對於中國政治文化之深刻體驗，使其分析領導人決策心理時，更能準確命中而有助於預測未來可能之政策走向。除此之外，書中所披露之若干歷史資料，卻也使我們赫然發現，毛澤東與鄧小平在處理兩岸與國際事務上，反而相較於現今之中共當局具有更大之創新思考與彈性。書中提及，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之初，首先出訪的國家便是日本，成功拉攏新力、東芝等日商成為首批進入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之外國資本。而毛澤東更曾在對日抗戰時期，向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表示，當共產黨打敗日本後，將允許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似乎與當前被中國政府奉為圭臬「台灣為中國神聖不可分割之領土」此一中心思想背道而馳。這些資訊或許將可成為未來兩岸協商談判時之重要籌碼，也鼓舞著具創新思想的改革

派官僚，制訂出更符合中國本身，乃至於亞太區域與全球利益之外交戰略。

如果說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為透過歷史、文化與哲學角度剖析當代中國之權威，則謝淑麗可說是經由政治分析途徑探索中國未來走向之大家。長久以來西方學界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往往受限於文化、歷史隔閡而產生若干盲點，使其觀察與分析始終有未盡全貌之憾，兩岸學者也針對此點多所批評，認為西方學界普遍對中國問題存在一定程度之「偏見」（Bias），因而影響外國政府面對中國問題時，決策之準確性。讀者藉由本書，不但可更為貼近中國政治之實然面，進而修正對應然面之預測，作為瞭解中國政府、預測未來政策走向之重要參考外，同時對於有志從事中國研究之學者而言，無論在資料上、分析架構上以及研究方法上均提供豐富的素材以及創新的思考模式，值得仔細一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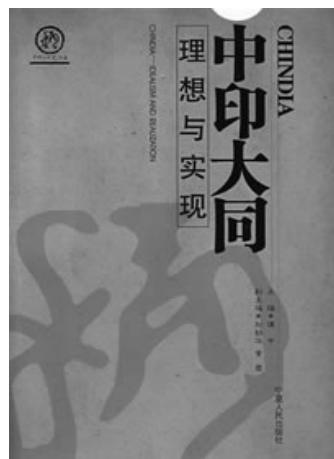


黃威霖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2005 年印度中央政府商務部部長蘭密施(Jairam Ramesh)合併 China 與 India 兩字，創造出一個新英文單字“HINDIA”他於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一書中寫到：「像大多數印度人一樣，我從小就聽說法顯和玄奘，他們的記載對發現我國的過去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作為尼赫魯的信徒，更使我意識到（中印）兩大文化之間的特別聯繫—有著相互借鑒、相互豐富特點的聯繫。」¹

主編譚中認為「中印數千年來的相互交往與激盪在中國產生了一種“interfacial strength/面界強度”中印文明精髓進行化學合成，變成新的文明氣質，使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獲得了無比的威力。」²文明交往的歷史事實，給予中印兩國堅實的合作基礎，提供超越地緣政治範式的資源。出於這份樂觀的期許，譚中邀集中印諸位學者就中印交往的各個方面撰文，期能讓「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團結起來，使中國的『天下為公』和印度的“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成新世紀的世界新秩序。」³

全書分為六個部份。第一部份「“HINDIA/中印大同”觀」從歷史以及人類學角度說明為何中國和印度得以「大同」而不陷入衝突。郁龍余、王邦維、譚中、王德華等人均從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說明中印兩大文明由於在文化上有極佳的親近性與互補性，使得雙方得以作千年的鄰居而彼此景仰、不動



書名：中印大同一理想與現實
著者：譚中 主編
出版者：寧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中國 銀川
出版日期：2007 年 4 月
頁數：473 頁
ISBN：9787227034643

¹ 譚中主編，《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2007 年，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5 頁。

² 同上，15 頁。

³ 同上，18 頁。

干戈。而印度學者談玉妮(Ravni Thakur)則是從經濟發展以及當代印度菁英的思維出發，認為當代中印雙方的互補性高於衝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談玉妮也認為當代中國知識菁英不夠注意也不夠瞭解印度，而造成許多誤解。

第二部份「佛教與中印文明“INTERFACE/面界接合”式」從佛教東傳中國的歷史探討中印兩大文明的交融如何產生巨大的「面界強力」(interfacial strength)⁴。譚中教授首先認為要將佛教文化視為人生觀、學術文化與社會改造三種運動的綜合，才能瞭解為何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會有如此高的互補性。大致上，譚中、薛克翹與黃蓉三人都認為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化太過重視世俗秩序，但缺乏心靈哲學和宇宙論。印度佛教填補了這個空缺，使得佛教的「自由王國」和儒家的「必然王國」接合，為中國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部份「以泰戈爾與譚雲山為代表的中印『兄弟』情誼」，以現代印度中國研究的奠基者—詩哲泰戈爾與中國學者譚雲山作為探討近代中印友好關係的切入點。魏麗明指出泰戈爾

⁴ “interfacial strength”一詞原為物理用語，意指將不同材料接合起來而增強物體強度、韌度。譚中借用此詞形容中印文明結合後所展現的卓越力量。譚中認為：「佛教文化運動在神州大地的運作形成一種中印文明交接，從而產生一種“interfacial strength/面界強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中印文明精髓進行化學合成，變成新的文明氣質，使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增加了活力。」見譚中，〈“CHINDIA 中印大同”—理想與實現〉，《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3期，2007年5月，9頁。

站在關懷全人類的立場，認為要拯救人類脫離西方物質文明的毒害，就必須提倡東方的精神文明。他認為印度與中國文明之中均重視擁有獨立個性的「自然人」，而唯有提倡人們獨立思考、相互友愛，才能遠離極權主義的威脅。

第四部份「“Hindi Chini Bhai Bhai/印度中國人民是兄弟”之歌」探討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的發展。印度獨立前夕，知識菁英與普羅大眾普遍對中國抱持好感，1950年代印度街頭“Hindi Chini Bhai Bhai”的歌聲便是明證。譚中以諸多歷史資料指出尼赫魯對中國的友好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中國政權是掌握在國民黨或共產黨之手，尼赫魯認為「文化中國」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因此他能一方面與宋美齡維持良好的友誼，卻又在共產中國成立後迅速予以支持。這樣的作為並不全然出於現實政治利益，而有很大一部份出於文化層面的情感投射。

但中印友好的關係，卻在1962年爆發邊境戰爭後迅速降到冰點。尚勸余認為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在亞洲地區的競爭，以及中國與印度對於西伐利亞國際體系的適應不良是中印關係交惡的主因。⁵ 尚勸余提出「整體/共同利益」與「具體/分歧利益」的區分法，主張中間雙方先在抽象的大方向形成共識，繼而處理細部利益（如邊界問

⁵ 尚勸余認為印度政治菁英提出以麥克馬洪線為中印邊界劃分的依據，以及讓西藏作為中印「緩衝地帶」的思維，在顯示出當時印度盲目爭取國家利益的思維。見《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289頁。

題)。

第五部份「冷戰與地緣政治對『兄弟』情誼的傷害」進一步檢討兩國交惡的原因。尚勸余與馬加力均認為冷戰與地緣政治的思維是造成兩國交惡的主因，也都樂觀的認為由於冷戰結束，兩國對於國家的運作方式都更為成熟，中印關係前景光明。但印度學者狄伯杰(B. R. Deepak)則認為中印若要「大同」，則邊界糾紛必須先行解決。他提出「一攬子方案」作為方法，亦即中印雙方各自在東西方邊界做出讓步。然而文末他指出中國方面欠缺讓步的誠意，是解決此問題的一大障礙。

第六部份「“龍象共舞”的前奏曲」前瞻中印未來的交往關係。張四齊認為中印雙方逐漸進入戰略夥伴階段，但在現實戰略層次的合作之餘，互信的夥伴關係卻仍有待深化。任佳、張毅、張敏秋等人則樂觀認為兩國間無論是在經濟、戰略還是文化方面都有很強的互補性，只要雙方能維持暢通的溝通管道，必能實現「中印大同」的理想。

主編譚中於序言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這本書一方面是為“CHINDIA/中印大同”造勢，另一方面是想開一個頭把“中印學”搞起來。」⁶因此本書的作者群基本上都認為中印雙方具備友好的基礎，也應往友好的方向前進。但在這份樂觀期許的背後，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⁶ 《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14 頁。

第一，本書所收錄的二十八篇文章當中僅三篇為印度學者所撰，⁷而本書當中的印度學者在看待中印關係時，卻透露出與中國學者相當不同的態度。首先是兩國菁英對對方的理解程度。在探討1962年邊境戰爭的問題時，中國學者多認為這主要肇因於當時印度政府太過執著於擴張主權範圍，但印度學者狄伯杰則認為主因是中國政治菁英缺乏對印度政治菁英的理解。⁸同樣的，談玉妮也指陳當代中國菁英不夠注意也不夠瞭解印度，才造成許多誤會。似乎對印度學者來說，中國對印度的漠視一直是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但中國學者似乎連這份困擾都沒有感受到。再者，中國學者如尚勸余認為中印之間的問題可以先尋求大方向的共識，再處理邊界爭議之類的「小事」，但從印度學者狄伯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邊界問題對印度而言是極其重要的。雖然狄氏也同意雙方在文化層面上能相互交融，但雙方對於現實利益的敏感度顯然有所落差。

第二，對於「面界強度」的論述尚須藉由史學研究而深化。譚中在論述中國文明所受的佛教影響時，常是從文學作品當中的用字或所透露出的思想為起點，接著說明該用字、思想實為印度佛教之產物，最後做出中國文明深受印度文明影響的結論。例如他指出黃巢《菊花》中的「金」、「香」二字實為佛教文化符號，詩中所流

⁷ 主編譚中也坦承「這樣的力量分配顯然是不平衡的，是會偏重於中國中心的」。見《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18 頁。

⁸ 狄伯杰認為中國當時將尼赫魯支持西藏自治的想法誤解為支持西藏獨立，為衝突升高的原因之一。《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352-353 頁。

露出來的農民起義與「自由王國」思想又與佛教平等思想相合，最後做出若非印度佛教東傳，中國文明斷無此等語彙、思想的結論。⁹這樣的推論方式頗令人疑義。較適當的作法應如薛克翹於〈佛教與中印兩大民族的認知與求同〉中所作的一般，詳論佛教思想影響中國本土思想的時間點。亦即中印思想交融的說法，還需要歷史研究的佐證。

第三，中印關係的發展或許可以作為新的國際關係典範。孫士海於〈中印攜手共建和諧亞洲〉一文中，提出「摒除相互制衡的地緣政治觀念」以及「不謀求建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等深具開創性卻又不失務實的理念來處理中印關係。¹⁰事實上，這樣的觀念已有部份開始在中印關係中實踐。例如至2006年7月為止，中印之間已開放了三個邊界口岸供邊民互市，學者張四齊認為這表示雙方已有朝「淡化邊界」的方向來處理邊界問題的共識。¹¹論者固然不應在鼓吹中印友好的聲浪中忽視雙方於現實利益上的競爭，但諸如此類有別於傳統地緣政治學的雙邊互動卻是十分值得借鏡的。

最後，CHINDIA 究竟是不是一個過度樂觀的概念？論者以為中印兩國同為人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邊界又緊密相連，在追求國力成長的同時，衝突當是無法避免。除卻上個世紀中葉所爆發的邊境戰爭，在過去數年之間中國與印度也曾因爭取石油等能源

而展開激烈的競爭。且當中印兩國的民族主義均隨國力同步上升之際，「龍象共舞」會否變成「龍象相爭」？

事實上，當今印度的中國研究社群對中國的態度也頗為分歧。對中國具有好感者，多從文化、歷史等角度出發；而將中國視為威脅者，則好自經濟、戰略等角度出發。主編譚中教授認為後者是強調零和競爭的西方文明觀點，長遠來說只會造成國際社會的衝突不斷。因此他提倡中、印之間以「地緣文明範式」取代「地緣政治範式」，作為兩國交往的指導觀念，且更樂觀的認為若中、印這兩個合起來佔據全球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國家團結合作、「大同」，則「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不遠矣。

這樣的看法固然有流於唯心之嫌，但從譚中教授的論點退一步看，中印大同可能雖不至於達成以文化貫融超越一切現實國家利益的目的，但透過文化達成某種區域主義的聯盟卻不無可能。印度近年來力倡建立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協各國的區域合作組織。¹²雖然比起歐盟，「亞盟」架構的發展目前仍不明朗，但若歷經多次民族國家戰爭蹂躪的歐洲尚能求得互信基礎，形塑當今的融

⁹ 《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116-117頁。

¹⁰ 《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455-456頁。

¹¹ 《中印大同一理想與實現》，395頁。

¹² 譚中教授曾於〈和諧外交與中日關係〉一文寫道：「印度知識精英對東亞的發展特別羨慕，很想把東亞一些國家提倡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改成“亞洲經濟共同體”(Asian Economic Community)，並且為它取了JACIK(這5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日本、亞細安、中國、印度、韓國)的混名。」見《聯合早報》，2005年6月3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6/200506032054.shtml>

合之勢，亞洲何嘗不能期待以
“CHINDIA”等觀念為基礎，尋求更深
層的合作？